

墨西哥汉学家莉莉亚娜：“归根结底我是中国的产物”

□ 余永和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访华的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时，一眼就认出了同传翻译莉莉亚娜·阿尔索夫斯卡（Liljana Arsovska），并且亲切地和她打招呼。莉莉亚娜出生于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后跟随丈夫加入墨西哥国籍，曾经两度留学中国，能说一口地道的汉语，现为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是墨西哥当代著名汉学家，翻译出版20余部中国文学作品。2014年荣获第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21年获得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大学成就奖章，被誉为“墨中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桥梁”。

“我时刻怀念我的中国”。莉莉亚娜由于学习成绩优异，高中毕业时获得马其顿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可以选择前往英国、美国或中国留学。遥远的中国在当时欧洲人眼里是古老而神秘的国度，对中国充满好奇且非常崇敬毛泽东的莉莉亚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从而与东方古国结缘。1981至1985年间，莉莉亚娜在北京语言学院（2002年更名为北京语言大学）度过了四年青春芳华，感受到了异国他乡的别样温暖。她在校期间努力学习汉语与中华文化，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与先后在北京语言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留学的墨西哥留学生罗贝尔托喜结良缘。

1985年，莉莉亚娜顺利毕业，本科毕业论文《〈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的女性角色比较》以两部文学经典为切口，尝试在中华文化与拉美文化之间进行穿越时代的对话。毕业后，夫妻二人先回到莉莉亚娜的故乡南斯拉夫，不久便定居罗贝尔托的祖国墨西哥。罗贝尔托将针灸疗法发扬光大，不仅在墨西哥国立理工学院讲授针灸课程，而且开设私人诊所，利用针灸技术诊治病人。莉莉亚娜则供职于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进行汉

学研究与教学，并师从墨西哥汉学奠基人白佩兰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之后重返北京语言大学深造，于2002年获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回顾自己的中国留学生涯，莉莉亚娜饱含深情地说：“我时刻怀念我的中国，那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

“让中国文化真正走进墨西哥”。除了母语马其顿语外，莉莉亚娜还精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英语、西班牙语及汉语，加之深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因而在翻译方面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尤其在口译与文学翻译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她1988年开始从事口译工作，1990年适逢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墨西哥，这也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拉美地区。当时墨西哥的汉语人才寥寥无几，而最初安排的译员临时出了问题，莉莉亚娜登场救急，从此跻身墨西哥总统府首席汉语译员的重要岗位，担任了后来墨西哥多任总统的汉语译员，也幸运地近距离接触了很多中国领导人。她最引以为豪的是多次担任习近平主席与墨西哥总统会晤时的译员。莉莉亚娜说：“习近平主席的言行，让我感受到中国领导人平等包容的独特魅力。”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刮起拉美文学旋风，但中国文学大规模进入拉美却慢了好几拍。2012年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时，墨西哥尚未出版莫言的作品，各大书店也见不到莫言的书籍。一些书商趁高价售卖从西班牙引进的莫言作品。莉莉亚娜发现这些“急就章”都是从英语转译的，明显缺乏原著的韵味。她建议中墨两国共同搭建在线翻译平台，及时沟通信息，打破中国作品无人译而墨西哥翻译家又无中国作品可译的窘境。她认为只有将翻译当作热爱的事业，而非赚钱的生意，才能确保译著

的质量。于是，在同事的鼓励下，她首先翻译出版了王蒙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从此踏上了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星光大道。同时，莉莉亚娜在墨西哥学院开设汉语翻译课程，培养汉语翻译人才，并且带领自己指导的研究生，组建中国文学翻译团队。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她和团队已经将老舍、张爱玲、王蒙、贾平凹、莫言、铁凝、刘震云、毕淑敏、雪漠、阿来等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使众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入墨西哥乃至拉美读者的视野。她译笔不辍，期望“以文学译介等方式再造巴别塔，让中国文化真正走进墨西哥”。

鉴于西班牙语国家使用的汉语教材和工具书皆为英译本的状况，莉莉亚娜总结20多年汉学研究经验，探究第二语言学习的规律，于2011年编写出版了拉美地区首部面向西班牙语国家汉语学习教材——《实用汉语语法》。该书图文并茂，纸质印刷版与语音光盘配套，详细阐释汉语的发音、写法与句法，尤其注重通过句式实例解析词汇和语法知识。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教育处负责人丁文林称赞该书在墨西哥汉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助力中墨建立友谊之桥”。莉莉亚娜几乎每年都到访中国，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积极向墨西哥乃至拉美地区讲述中国故事，宣介中国成就，为促进中墨交流与中拉合作搭建文化桥梁。

她批评欧美基于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形象，体现的是殖民主义的价值观。她认为，拉美民众之前主要通过西方作品了解中国，难免出现认知模糊甚至错误的情况，而通过阅读汉语经典，就能真正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习俗；只有摆脱西方中心论

的立场，才能公正地看待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伟大成就。她也驳斥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也给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带来重要机遇。

莉莉亚娜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飞速发展及巨大变化，称赞中国领导人解放思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努力实现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逐步推进全方位改革开放格局，将引进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肯定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始终捍卫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坚定支持，也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赞赏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墨西哥、拉美乃至全世界走向共同繁荣。她曾多次盛情邀请中国作家访问墨西哥，也经常参与中国国内的文化交流，如出席北京语言大学举办的“中国—墨西哥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及“汉学与翻译”学术活动，参加中国翻译协会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翻译中国·拥抱世界”系列访谈活动，以及“文学缘：阿来与拉丁美洲”文学对话活动，希望利用文学的媒介帮助墨西哥乃至拉美人民了解真实的中国。

莉莉亚娜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情感，曾经说：“不热爱中国就是不热爱我自己，因为归根结底我是中国的产物。”如今，年逾六旬的她依然以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为依托，向墨西哥客观介绍中国，“助力中墨建立友谊之桥”，推动中墨文化交流与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



众所周知，英国是近代对华输入鸦片最多的国家，给近代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鲜为人知的是，美国是近代对华输入鸦片、获利仅次于英国的国家。作为对华经济侵略的一种重要方式，19世纪美国对外鸦片贸易不仅对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人身伤害，也给近代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美国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攫取的巨额利润加速了美国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

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之前，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经济一直是以索取自然界的物质为主，它的木材、鱼、朗姆酒等产品只能在大英帝国内进行贸易。北美殖民地渴求茶叶、瓷器、丝绸等中国商品，但英国禁止它与亚洲尤其是中国直接贸易，中国商品只能经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转手销售获得，这剥夺了美国商人从中获取高额利润的机会。1783年，英美双方签订《巴黎和约》，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由于英国禁止美国与其殖民地进行贸易，中国是少数为美国商船打开大门的目的地之一，时任美国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告诉国会，“尽快派船前往中国”。因此，第一艘前往中国的美国商船“哈里特号”装载花旗参等商品，立即从纽约起航。然而“哈里特号”在好望角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截获，没有到达中国。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皇后号”商船首次到达广州，是中美直接贸易的发端。1784年2月，“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出发，装载的货物包括毛皮、朗姆酒、30吨花旗参和1.8万块银元，经过6个月航行，到达广州黄埔港。当它返航时，装载了800箱茶叶、2万条南京棉布裤子、大量瓷器等。这些中国商品销售所得3万美元，投资回报率达到25%。这深深刺激了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城市的商人和船主，他们认识到，只要把中国商品输入美国，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纽约一份报纸说，这次航行开启了“一个幸福的新时代”。现代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皇后号”的航行是“堪与1776年政治‘独立宣言’相比的‘经济独立宣言’”。“中国皇后号”的货物押运员塞缪尔·肖向美国外交部长约翰·杰伊汇报了这次航行的情况，杰伊向国会通报。国会议员们回答说，“特别满意美国公民首次成功地建立了中美直接贸易”。此后20年里，美国对华贸易商船的数量超过任何其他欧美国家。

但是与此前欧洲国家商人一样，美国商人对华贸易也面临一个重大难题：中国几乎不需要美国的产品。虽然中国市场需要一定数量的花旗参，但被认为质量差；毛皮和檀香木虽然有一定市场，但是北美的毛皮猎取越来越难，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檀香木被砍伐殆尽，难以为继。为了购买中国商品，对华贸易的美国商人不得不支付白银。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美国商人向欧洲或南美洲销售货物，然后用银元购买中国商品。美国商人购买中国商品的欲望是无限的，但是能够提供的白银是有限的，因此他们常常处于贸易入超状态。于是，美国商人决定效仿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入鸦片。

自19世纪始，美国商船染指并强化对华鸦片贸易。为了打破英国从印度输入鸦片到中国的垄断地位，美国商人一面从印度走私鸦片到中国，一面寻找鸦片的其他来源。1805年，他们在奥斯曼帝国找到了鸦片产地，通过伊兹密尔港，运出鸦片输入中国。土耳其鸦片质量比印度的差，但因价格便宜畅销于中国市场。许多美国商人闻风而动，云集伊兹密尔。根据现代西方学者统计，在1805—1839年间，美国商人就从土耳其购买了至少9144箱鸦片输入中国；1818年，美国商人走私了中国消费的鸦片总数的1/3；1831年，美国商人输入中国鸦片近1500箱，占输入中国鸦片总数的8%。1827年，美国对华贸易取得平衡；19世纪30年代，鸦片已经成为美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品，占美国输入中国商品总价值的1/4；美国输入中国的白银不断减少，据中国学者统计，从1821—1830年的18974160两下降到1831—1840年的4064400两，下降比例将近80%。所以美国鸦片商人福布斯说，“整个对华贸易都是建立在鸦片贸易基础之上”。

与此同时，美国商人发明了“伶仃岛鸦片走私制度”。为了规避清政府禁烟政策和措施，1803年，帕金斯公司驻广州代理约翰·帕金斯·库欣想出了一个对策：从土耳其运载鸦片的商船先派人通知库欣，然后停泊在珠江口外的伶仃岛；其他鸦片走私商人到伶仃岛去购买库欣的鸦片。这种做法被称为“伶仃岛鸦片走私制度”，后来美国其他鸦片商人也利用

十九世纪美国对华鸦片贸易

□ 施 诚

这种策略向中国走私鸦片，既可以规避被清政府查禁的风险，又可以获得鸦片走私的高额利润。美国学者格林比在《形成美国的中国贸易》一书中坦承，“几乎所有出现于广州的美国公司都参与了鸦片走私”。

19世纪中期，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两次鸦片战争，但美国商人从中获利甚多。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对华贸易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为美国鸦片走私商人完全控制中国鸦片市场提供了有利“契机”。而当英国取得胜利后，美国同样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各种权利，包括鸦片贸易合法化。

19世纪对华鸦片贸易使美国赚得盆满钵满，对美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第一批百万富翁就是对华鸦片贸易商人。对华鸦片贸易商人阿斯托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百万富翁。更让人称奇的是，通过对华鸦片贸易致富的沃伦·德拉诺，在1857年金融危机中损失了大量财富后，他立即返回广州重操旧业，很快又致富。许多富翁的子弟因此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从波士顿拉丁语学校、米尔顿学院到哈佛、耶鲁、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大学等，并利用婚姻缔结家族联盟。如沃伦·德拉诺33岁从中国返回美国后，迎娶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之女凯瑟琳·黎曼为妻。他们的女儿莎拉所生的独子就是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百万富翁就是美国式“门阀政治”的“先驱”。

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发财政危机，而且让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民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严重毒害。然而美国一些权贵或者为鸦片贸易辩护，或者对此讳莫如深。虽然参与对华鸦片贸易的美国商人意识到鸦片对中国的危害，但是他们漠不关心，只关心商业利润。有的甚至说，鸦片走私“是公平的、体面的、合法的贸易”，它的后果与“进口葡萄酒、白兰地或酒精饮料”一样，是有限的。有的美国政客甚至为鸦片贸易公开进行辩护。1841年，曾任美国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撰文声称，清朝禁止英国输入鸦片是挑战“各国的权利”。美国学者雅克·唐斯指出，大多数美国鸦片商人都小心翼翼地隐藏他们商业的真实性质，甚至警告家族成员不要公开他们的信件；有的鸦片贸易商人的后代故意销毁提到祖上买卖鸦片的文獻。

有美国学者认为，“对华贸易是美国投资的引擎”。积累了巨额财富的鸦片贸易商人，开始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和工厂，这些有力推动了美国早期工业化进程。



（上接1版）

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根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加强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整体谋划和推进，科技创新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基础前沿研究实现新突破，战略高技术领域实现新跨越，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创新主体和人才活力进一步释放，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当前，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坚持“四个面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我国科技资源配置一定程度存在封闭、分散、重复、低效等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形成协同创新的综合优势，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适应国家发展对科技创新提出的使命任务，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示范作用，多出战略性、关键性重大科技成果。建制化的国家科研机构应着力解决影响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科技问题，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高水平研究机构应充当主力军，把统筹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三大功能有机结合起来。科技领军企业既是出题人，又是答题人、阅卷人，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形成一批跨领域、大协作、高

强度的创新基地。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谁抢占基础研究发展的先机，谁就能占据未来几十年的战略主导权。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凝练基础研究关键科学问题，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形成更多原创性科研成果。支持基础研究选题多样化，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创造条件支持科研人员自由探索，鼓励科研人员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形成更多由好奇心驱动的创新。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建立基础研究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加大对重点团队、基础研究项目的稳定支持。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支持基础研究。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执行和专业机构管理体制。扩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范围，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和更大资源调度权。将科研经费用在“刀刃”上，对科研经费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失信情况，应纳入黑名单，予以严惩。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企业是科技需求的主要提出者、科技成果市场价值的最终实现者，贯通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链条，是最活跃的创新力量。面对不断升级的外部打压遏制，我国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必须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打好这场国际竞争突围战。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优势和产业配套体系完善的供给优势，着眼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强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创新成果供给和应用场景匹配，打造高效协同、要素集聚融通的创新生态。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另外，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202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超过8.6亿，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2.5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人才资源总量、研发人员总量均位居世界首位。但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缺乏一流顶尖创新人才，与建成人才强国、科技强国的需求相比差距较大。我们应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全方位用好人才，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战略人才居于全球科技前沿，能够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引领科技创新，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量。作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中的“关键少数”，战略科学家科学素养深厚、研究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强、能组织大兵团作战，应充分发挥他们在引领重大原始创新、参与科技战略顶层设计、整合科技创新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能够围绕国家重点产业、重点领域，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破解“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他们在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锻造精品工程、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国中的主力军作用。

支持青年创新人才成长。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思维最活跃、想象力最丰富、最容易出成果的时期。同时应看到，青年创新人才成长通道狭窄、科研内卷严重、生活压力大等问题较为突出。要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待遇。深化改革创造各种条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基地中给予青年科技人才更多机会。完善优秀青年人才全链条培养制度，改进青年科技人才评价机制，创新评价方式，科学设置评价考核周期，减少考核频次。采取提高薪酬待遇等务实举措解决青年科技人才的实际生活困难，减轻青年科技人才非科研负担，让青年科技人才能够安身、安心、安业，心无旁骛专心从事科研工作。

做对创新人才激励。进一步深化人才领域改革，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一方面，向实际用人主体充分授权要真授权、授到位；另一方面，用人主体也应持续深化改革，确保下放权限接得住、用得好。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统筹“破四唯”与“立新标”。分类健全人才评价标准，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对于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从事基础研究，进行应用技术开发的不同人才进行差异化分类评价。科研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和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切忌将科研人员视同干部管理。遵循科研规律，破除行政化思维，建立容错机制。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的中长期激励，为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造良好的生态。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